

〈論 説〉

白虹事件の原因の深層

——日露戦争が日本の新聞に与えた影響

王 魯 亞

要旨：日本の新聞史上最悪の筆禍事件として、「白虹事件」は政府の言論弾圧の結果だけでなく、その背後には、より複雑な原因の深層はある。本稿は日露戦争による、日本ジャーナリズム構造の変化を切り口に、日露戦争の後に日本の新聞界、民衆と政府の三者の間の関係を整理し、それによって筆禍発生の原因の深層を探る。日露戦争開始後の大衆化の傾向が日本の新聞界を席卷し、民意は一貫して高揚した、「大阪朝日新聞」は新聞、民衆、政府間の関係を見誤り、民意の乖離を招いた、また他の新聞の裏切りのせいで、「大阪朝日新聞」は孤立し、さらに様々な原因もあって、最終的に筆禍の発生を招いた。

キーワード：白虹事件；日露戦争；《大阪朝日新聞》

The Deep Cause Of The "Byakkoh Event"

—— What Effect Did The Russo -Japanese War Have On Japanese Press?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literary inquisition in Japanese journalistic history, the "Byakkoh Event"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government repression. There is a more deeper and complex reason behind it. Based on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apanese press,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the change of the Japanese press pattern caused by the Russo-Japanese War,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Byakkoh Even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I think, the forces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re becoming stronger after the Russo Japanese War, at the same time rising public opinion makes the "Osaka Asahi Shimbun" wrongly judg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spaper and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 the betrayal of people and the newspaper peers caused the "Osaka Asahi Shimbun" isolated and helpless. Various reasons intertwined, eventually led to the occurrence of the "Byakkoh Event".

Key word: the "Byakkoh Event"; the Russo-Japanese War; Osaka Asahi Shimbun

“白虹贯日”事件深层原因探析

——兼论日俄战争对日本报界的影响

摘要：作为日本新闻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笔祸，“白虹贯日”事件并不仅仅是政府言论压制的结果，其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深层原因。本文试图以日俄战争造成的日本报界格局变化为切入点，还原日俄战争后日本报界、民众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探析笔祸发生的深层原因。通过将该事件放在更大的时空背景下进行考察，笔者认为，日俄战争后带来的民众化趋势席卷日本报界，高涨的民意使得《大阪朝日新闻》错误地研判了报纸与民众、政府之间的关系，民意的最终背离以及报业同行的转向使《大阪朝日新闻》在与政府的对抗中陷入孤立，种种原因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最终导致了笔祸的发生。

关键词：“白虹贯日”；日俄战争；《大阪朝日新闻》

日本新闻史上，因发表不当言论导致报纸停刊、报人入狱的事件不计其数。1918年发生在《大阪朝日新闻》的“白虹贯日”事件是众多笔祸中最严重的一次。这次笔祸导致《大阪朝日新闻》剧烈的内部动荡，社长村山龙平 and 多位资深主笔被迫辞职，日本报界集体屈服于政治强权，使得该事件成为日后侵略战争中日本报界被政府收编的一次预演。对于这次笔祸的产生，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寺内内阁对《大阪朝日新闻》在西伯利亚派兵和“米

骚动”事件中的过激言论进行压制的结果。应当说，这种解释基本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然而，这种站在政府强权角度进行的解释，无法说明一种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现象，那就是为何这次笔祸偏偏发生在《大阪朝日新闻》身上，其他同样参与对抗政府的报纸却几乎没有受到直接的负面冲击？另外，不同于日本新闻史上的多次笔祸，“白虹贯日”事件最终导致了日本报纸经营理念的转变，这不仅仅是报纸单纯屈服于政治强权的结果，而是报纸内部的主动选择。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促使了报纸的这种转向？为了回答这些疑问，有必要把“白虹贯日”事件放在更大的时空背景下做进一步的考察。笔者认为，笔祸发生的伏笔早在日俄战争爆发时就已埋下。

一、日俄战争为日本报界带来的变革

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的日本报界，以日俄战争爆发为契机，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日俄战争前后，日本报纸发行部数急剧增加，读者从少量精英知识阶层扩大到普通底层民众。读者层的变化导致报纸编辑理念庸俗化，煽动性言论甚嚣尘上。第二，报纸发行数量扩大导致报社主动或被迫投入大量资本，进行贩卖竞争和号外战，客观上促进了报纸向企业化方向迈进，同时资本压力开始在报界显现。这两点变化逐渐改变了当时日本报界的格局。

（一）读者层的变化导致报纸产生煽动机能

日本报纸是通过政府精英主导并且为了精英的利益产生的，国民并不是报纸产生的原动力。报纸的早期读者主要局限在知识精英阶层，发行量有限，目的是辅助明治政府的文明开化，并不以营利为目的。早期日本报界主要由发挥政治功能的“大报”主宰，报纸版面以政论为主，报人亦多与政府官员保持密切关系。随着西南战争和甲午战争的爆发以及日本国内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报纸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但报纸读者依然集中在拥有政治话语权的上层社会。对于识字率不高、生活水平低下的日本民众来说，定价不菲的报纸在明治初期并没能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明治初期的读者认为报纸的本

质只不过是政府对受众进行开化教育和思想启蒙的传播工具甚至武器，”¹随着新政府的政权渐趋稳固，政治诉求逐渐降温，社会的娱乐要求开始显现，面向中下层民众，以营利为目的的“小报”登上历史舞台。²此后，日本报界一直处于“大报”与“小报”并存的双重构造中，但就社会地位而言，以政治言论为主的“大报”依然远高于以市井消息为主的“小报”。对于“小报”出身的《大阪朝日新闻》，这也是日后困扰其发展的重要背景。

由于日本政治局势的复杂变迁，“大报”与“小报”在多年共存中实现编辑内容的互补和融合，日本报界进入“中报”时代。报纸的政治性逐渐削弱，营利成为报界共识。及至日俄战争，报纸发行量急剧增加表明报纸读者远远超过了拥有政治选举权的精英阶层，已经向下层民众渗透扩散。日俄战争是亚洲小国日本面对强大的西方列强沙俄发动的一次“堵上国运”的战争，为了解战况，以前不看报纸的民众纷纷以报纸为媒介，加入到时局的讨论之中。对于报社而言，这是一次千载难逢地扩大报纸发行数量的机会，据当时《报知新闻》的贩卖担当斋藤久治说，“在战争开始之前，报纸的销量停留在7、8万份，战争中上升到20万份，讲和条约引起的骚动平息以后，一跃上升到35万份。”当时著名的独立报纸《国民新闻》在日俄战争开战前发行2万份，战争中达到了4万份，讲和条约时达到了6万5千份，比战前增加了3倍。战后这种情况被维持下去，形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大阪朝日新闻》的发行量也从战前的10万4千一跃上升到“白虹贯日”发生之时的30余万。³

读者层的变化引起报纸编辑方针和功能的改变，报纸为了吸引中下层读者的眼球，内容逐渐呈现庸俗化趋势，最终出现了以《万朝报》和《二六新报》为代表的“黄色新闻”潮。然而，日本的“黄色新闻”并不仅仅以煽情和滥俗的消息制造轰动效果，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编辑方针。那便是利用当时弥漫在日本社会中下层民众中的不满情绪，以揭露官商勾结丑闻为手段，将“耸动”作为一种编辑技术，把自己包装成正义的化身，煽动民众将不满情绪从社会领域导向政治领域，从而引起了一系列威胁统治利益的社会暴动事件发

1 山本武利：《近代日本的新闻读者层》，法政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2 小野秀雄：《日本新闻史：创始、指导、企业时代》，良书普及会1947年出版。

3 有山辉雄：《近代日本新闻业的构造》，东京出版株式会社1995出版。

生。也就是说，在日俄战争前后，由于民众对战局的关心导致报纸销量大增，报纸为了继续留住读者，不断降低编辑格调，煽动读者对官商腐败生活的愤慨，以此获得读者的支持和共鸣。此后，日本报界的煽动性机制被不断利用和完善，大正时期的日本民众在报纸的言论煽动中逐渐成为对抗政府的一支强大力量，倒逼统治者不断采取措施打压言论。

（二）激烈的贩卖竞争倒逼报社进行资本扩张

日俄战争导致报纸发行量剧增，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了日本报纸的编辑方针，同时对日本报界的组织形态产生影响，进一步重构了报界格局。为了将报纸销量维持在较高水平，报社之间在号外、附刊、广告以及定价打折等经营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各大报社积极投入大量资本和设备，进行组织化的大规模贩卖活动，促使报社不断向企业化方向发展。

日本报纸诞生之初，创刊者主要是幕府的下级武士和旧臣等知识精英。报纸只不过是报人与政界取得联系的“踏脚石”，是报人的私有财产，规模较小，组织化程度很低，甚至在经济上还要靠政府暗中接济。随着报纸政治功能的衰退，营利主义成为业界主流，报社规模逐渐扩大，组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随后，数次战争的爆发导致号外成为报社打压对手的杀手锏。时效性优势使得各大报社纷纷加入“号外战”，随着报社之间竞争的加剧，“号外战”俨然成了“资本战”，一些资本雄厚的大报社热衷于以这种方式对竞争对手造成经济压力，从而将其挤出日本的报业市场。号外的大量发布依靠通讯技术、印刷设备和邮递渠道的整体提升，报社需要源源不断地扩充资本保证自己始终处于信息收集、发布和传递的优势地位。随着报社资本的不断扩充，以往简单的报业组织无法满足激烈的竞争需求，以《大阪朝日新闻》为代表的报社佼佼者率先进行企业化改革的尝试。

日俄战争带来的报纸发行量的急剧增加，导致日本报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之中，各大报社开始意识到资本的重要性。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报社都有能力和有远见持续投入大量的资本扩充报社的规模，在日俄战争之前发行量靠煽动手段达到发行量第一位的《万朝报》，正是由于缺少资本意识，

在广告销售和版面扩充方面丧失先机，一味追求言论影响力，从而在日俄战争后迅速衰落，难以与《大阪朝日新闻》抗衡，最终退出大正时期的历史舞台。能否抓住战争这个时间窗口利用资本优势脱颖而出，关系到报社有多少胜算在未来的报界格局中确保优势地位。在这其中，有些报纸在日俄战争前后不断实现资本扩充，完善企业化架构，有些报纸却被迫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逐渐在经营上捉襟见肘，被迫退出报界市场，日俄战争的爆发导致了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日本报界格局的重构。

二、日俄战争后日本报界与民众的关系

日本报纸诞生之初就与政治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明治初期，报界即参与“佐幕”和“勤王”等运动，以言论发挥政治功能。但是早期的报纸读者主要集中在上层政治精英群体，数量有限，报纸能够动员的社会力量非常欠缺，民众本身也没有参与政治的热情和觉悟，此时的报纸远没有成为联系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日俄战争前后，报纸的读者层不断下移，数量迅速增加。同时，明治中期以来的民主化思潮使得该时期的日本民众逐渐对政治抱有超越以往的热切关心，报纸具备了政治动员的读者基础。以《万朝报》为代表的日本报界在此时完善了煽动机制，充分将民众的不满引向政治领域，以“舆论引导下的民众”作为武器，不断介入并影响政治。除言论以外，报纸还组织全国性的记者团体公开活动，反政府的演讲和游行示威层出不穷，甚至直接走向前台，组织政治斗争，报纸俨然成为民众的代言人，不断对政府施加压力，日本报界整体呈现出了民众化趋势。

日俄战争后，以反对媾和条约为契机，对政府的软弱充满怨气的民众制造了日比谷烧打事件，民众猛烈袭击了公园附近的内相官邸，骚乱持续了3天，从东京波及到日本各地，全国为之震荡。自此，民众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登上日本历史舞台。不可否认，报纸作为当时唯一强有力的大众媒介，为日本近代民众的民主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报纸为民众品评时政提供了思想阵地，将反对藩阀专制和要求民主的呼声传递给民众，唤起民众对

反腐败政治的觉醒，为日后大正民主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这种民众化趋势却存在一种隐患，那就是此时的报纸过于相信民众的力量，错误估计了政府强权的压力。报纸坚信民众是在自己的长期动员下被鼓动起来的，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只要报纸愿意，就可以时刻掌握煽动民意的主动权。民众只不过是没有什么自己思想，可以随意被报纸操纵的乌合之众。正如当时的民权思想家吉野作造所说，“此时的民众运动，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能说是积极、自发的。其实是通过1905年事件（日比谷烧打事件）目睹民众出乎意外的强大力量的一部分人，再次对民众的利用。运动无非是在这些人的煽动和计划下被制造出来的。”⁴吉野作造口中的“这些人”指的正是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言论并且抱有政治目的的报人。

此外，当民众变成“暴民”威胁政治秩序时，报纸常常隔岸观火，保持沉默。当民众的力量无法到达报纸的政治目的时，报人便亲自走向前台，组织各种反政府活动，以此煽动民意。这种方式在大正民主的思想热潮下屡试不爽，往往造成政府的被动应对，甚至内阁也曾被这种报纸煽动起来的压力而推翻。在“白虹贯日”事件中，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煽动模式的影子，只不过报纸高估了自己操纵民意的能力，也高估了民众的反政府热情。面对大正时期由报纸不断煽动起的种种政治运动，民众已显出倦意。报纸无法摆脱长久以来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一边煽动民意，一边开始与藩阀元老联手，以图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例如第一次护宪运动中，黑岩周六等报人与元老山县有朋等人联手共同推翻了内阁，而藩阀政治此前一直是报界攻击的目标，这一切都加深了民众逐渐远离报纸的趋势。至“白虹贯日”事件爆发时，报纸才发现没有了民意作为支撑，在政治强权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

三、日俄战争后日本报界与政府的关系

日本报界与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蜜月”也有“寒冬”。总体来说，日俄战争前政治力量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条例以及经济援助等软硬兼施的手段，

4 田雪梅：《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从明治到大正》，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对报纸的监管是有力的。日俄战争后，拥有大量读者的报纸在政治和社会机能上逐渐扩大，记者作为能动的政治主体，不仅进行新闻报道，还组织实际的政治运动，把政党和民众都卷入其中，不断搅乱由元老、官僚所参与的政治过程，成为与政治领导层对立的不安定因素。

明治中期到大正初期，藩阀政治一直是自由民权运动批判的对象。1912年靠军部势力上台的桂内阁成立，日本报界掀起了第一次护宪运动。报界充当了护宪运动的急先锋角色，联合参加运动的各个党派，成立了“拥护宪政同志记者会”，深深地卷入了各大党派的政治争斗中。不久，报社记者成立“拥护宪政全国记者会”，涉及全国155家报社，参加记者人数达到344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组织并不是有报社促成了，而是记者以个人名义参加的，表明在当时记者具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感，而在报界还没有普遍形成比较完善的企业化形态时，记者具有相当高的自主性，不仅可以鼓动民众参与立宪政治，甚至可以直接参与组织运动。在报纸的煽动下，桂内阁在民众的愤怒中辞职，护宪运动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此后继任的山本内阁因为“西门子事件”和“刃伤记者事件”再次成为各大报纸的攻击目标，黯然落幕。

宪政拥护运动和山本内阁被打倒以后，接着上台的大隈和寺内内阁对于媒体导致的这种民众的倾向抱有很大的戒心。日比谷烧打事件之后，社会整体的变动以及民心的变化导致了民众力量在社会各个领域开始显现。大隈内阁对待报纸采取融合政策，希望协调内阁与报纸之间的关系，抓住各种机会为记者提供优厚待遇，表面上与报纸言论保持距离，却在暗地里通过各种方式干涉报纸言论，表现出对于报纸记者的警戒。而寺内内阁对待报纸采取的是强硬的政策，两者的关系也因此更加险恶。

经过大隈和寺内内阁，表面上看起来报纸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实是陷入了困境：一方面报纸对自己控制和煽动民意的能力过于自信，却没有意识到明治末年以来不断煽动民众运动的报界正在失去民众的兴趣和信任。另一方面，过于自信的报界以为只要自己裹挟民意，便可以拥有对抗政府的资格，呼风唤雨，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却忽略了政府与日本报界长期的合作关系，报界在政府力量的渗透下并不如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团结一致。

四、白虹贯日事件的深层原因

总体来看，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的日本报界，正是以日俄战争为契机，产生了两种变化。报纸一方面为了继续维持销售量，吸引民众的注意力，大肆使用煽动手段，高唱民本主义，卷入大正时期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中，充当民众参与政治的重要中介；一方面为了不在激烈的报界竞争中被淘汰，必须不断扩充资本，走向企业化道路。归根到底，这两种变化的目的是统一的，都是为了更多的争取读者，扩大报纸的影响。在激烈的报界竞争中得以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的报纸，需要不断地在两种变化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这两种变化又间接导致了日本报界与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报界总体呈现出民众化趋势，却同时因为煽动民意导致社会动荡，成为政府的眼中钉。因此，对当时的日本报界来说，适应新的历史形势，必然面临着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报纸、民众和政府的博弈之间形成，互为因果，“白虹贯日”事件正是这些矛盾的集中爆发。

（一）《大阪朝日新闻》出于经营和社会地位的双重考虑，不得已选择民本主义作为编辑方针，希望得到民众的支持，然而民众在日俄战争后引起的报界煽动化浪潮中逐渐倦怠，最终导致《大阪朝日新闻》陷入孤立。

日俄战争后，在经营上不断蒸蒸日上的朝日新闻却面临着新的问题，那就是与会社资本实力不想匹配的社会声望的低下。在当时，一般的报纸都在弱化言论，走商业化道路，然而在商业化道路上独占鳌头的《大阪朝日新闻》却不断受到言论不振的评价，对《大阪朝日新闻》来说，在言论地位上得到认可可是迫切要实现的新目标。为了摆脱小报出身的自卑感，报社的驱动力逐渐由扩大发行转向提高社会声望。在此之前，日本报界一直被看作标杆的是像陆羯南的《日本》这样的“独立报纸”，“独立报纸”的活动主题基本在政治领域，采取的方式是社论。陆羯南认为以自己信奉的主义至上，根据政治情况进行政治言论才是报纸存在的理由，对报纸的党派性和营利性进行

了严厉地批判。《日本》虽然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声望，却因为贬低报纸的营利性而无法进一步发展壮大。与此相对，《大阪朝日新闻》是在有了一定资本积累之后，急于提高社会地位而开始重视言论的。但是说到底，《大阪朝日新闻》都是出于经营的角度考虑，《大阪朝日新闻》并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的独特理念，而是依靠经营的思维不断摸索前进。

作为朝日新闻社的经营者，村山龙平和上野理一并没有自己独有的编辑理念，而是将会社的编辑实权交给有能力的社员，实行“他力尊重主义”。从《日本》招聘过来的杉浦重刚、今外三郎、长泽别夫、鸟居素川等记者逐渐进入朝日新闻的编辑中枢。到了明治末期，随着采访对象的多样化和编辑部规模的不断扩大，会社内部粗放的组织架构不得不面临新的整改，急需编辑理念的统一。此时《大阪朝日新闻》分化出了以鸟居素川和西村天因分别为主导的不同的编辑理念。两人开始了会社编辑主导权的激烈竞争。鸟居受《日本》的创始人陆羯南的“国民主义”思想的影响，愿意直面当时从下至少产生的来自民众的舆论潮流，推进民本主义。而作为汉文学者的西村天因则主张面对动荡的时势采取保守姿态。两者的对立很明显是保守和民本主义编辑路线的对立。正如前面所说，《大阪朝日新闻》在经营过程中没有确定明确的办报理念，村山龙平和上野理一也没有过多地表明过自己的新闻思想，因此，鸟居和西天的对立在报社内部都不能找到合理的思想支撑。经过激烈的社内斗争，村山龙平最终依靠个人威望选择支持鸟居素川全权负责《大阪朝日新闻》的编辑工作。虽然村山龙平对鸟居派的民本主义并不赞同，但是从经营的角度考虑，鸟居的方法能够适应当时的社会潮流。自此，《大阪朝日新闻》开始了鸟居体制，民本主义的思想开始在《大阪朝日新闻》社内抬头。《大阪朝日新闻》利用自己庞大的资金和贩卖网络支持着这种民本主义思想的发展，然而现实却没有那么乐观，民本主义与报纸的经营之间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

明治末年以来，沉淀在社会底部的种种不满被报纸不断激发和搅拌，导致民间舆论沸腾，到日俄战争前后达到高潮。报纸将舆论投射到“藩阀政治”，造成民意与政府的激烈对抗。民众的这种不满激烈又充满不确定性，具有难以预料的破坏力。《大阪朝日新闻》认识到，要想在企业化道路上持续发展，

就不能仅仅成为“喇叭式地煽动家”，而是应该寻求一种更加稳妥的言论方式，理性地对日俄战争后不断沸腾的民意进行疏导，将政治与社会问题分开，在“国家”这一名义下对两者进行统合，对藩阀和官僚政治家的专权进行否定，依靠民意来推进政治决策。这个时期《大阪朝日新闻》旗帜鲜明地反对向藩阀的妥协，同时主张实行政党内阁，主张将国家支配渗透到国民意识的内部，扩大国民思想的自由，确保社会的自律。这是在其他报纸上都没有看到过的特色。《大阪朝日新闻》希望采用自认为稳妥的言论方式，使民众针对政治的公愤得到缓解，同时使报纸从煽动机制中解脱出来。

但是《大阪朝日新闻》高估了民众的政治意识。日俄战争以来，报纸有非常多煽动民意的经验，这种煽动更多的是一种投机行为，在山本内阁被打倒以后，这种方式便陷入了瓶颈。民众开始厌倦一直冲刺在报纸上的“宪政拥护”和“打到藩阀”的口号，“黄色新闻”时期被煽动起的民意已经逐渐冷却，民众对报纸开始失去了好感和信任。例如在西伯利亚派兵问题上，不管是否主张出兵，各报纸都没有得到读者的过分响应。《大阪朝日新闻》感慨，“日清，日俄战争开战时，“我国国民高涨的爱国热情”，“国民的血比军阀还要沸腾”，但是这次的情况却不一样。”以前在报纸的煽动下举行的国民大会或者暴动事件等大规模的集会在西伯利亚派兵问题上并没有出现，甚至可以说“当时民众从上到下对这件事情都缺乏讨论的热情。”报纸言论和读者之间的呼应关系开始消失，变得冷却下来。民众对报纸单方面从上到下的启蒙和动员逐渐失去了兴趣，报纸和读者的关系开始变得松弛。民众的离去使得报纸和政府之间失去了缓冲，一味主张民本主义的《大阪朝日新闻》逐渐陷入了孤立。

（二）日俄战争以来被报界煽动起的民众不断强化反政府力量，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使得寺内内阁过分紧张，将报纸视为绝对危险物，高举民本主义大旗的《大阪朝日新闻》更是成为寺内内阁的最大敌对目标。

日俄战争以来，不断高涨的民众化趋势逐渐使政府当局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强大，并因此产生戒心。寺内内阁在1917年5月28日召开的地方长官第

三次会议中提出：“国民思想的变迁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必然伴随的现象，然而近段时间言论接的风潮过于放肆，危险激进的言论层出不穷，纸面上不断报道的卑劣的新闻记事对国民的思想产生了恶劣的诱导，导致国民对国体的误解以及对皇室尊严的亵渎，淳朴的民风逐渐被污染破坏（中略），去年冬天以来不断援引其他国家的政变（罗马尼亚王朝的崩塌），开始论及我国国体……”在这里，寺内认识到国民思想的变迁是必然的现象，然而他认为，国民思想正在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变迁，其中的罪魁祸首就是当时报纸上“危险激进的言论”以及“卑劣的新闻记事”。⁵在国内，即使很小的社会动向都可能会在报纸的煽动下产生最可怕的后果，所以必须要对这种现象进行制止。这种因为国内民心的变化以及外国革命的增加带来的被夸大的危机感，并不是寺内内阁本身所独有的，而是当时的权力者普遍的看法。

寺内内阁对民本思想的敌视遭到报界的反击，《大阪朝日新闻》对于寺内内阁的“非立宪性”和“善政主义”的批判最为激烈，甚至提出“（寺内）手握大权，压制民意，背弃五条誓文，在世界趋势面前畏难退缩，怎堪辅佐大任，希望速速辞职”。⁶二者对立的顶点是1917年4月的第13次的总选举，这次选举被寺内内阁认为是巩固自己政治势力的一次势在必得的选举，而《大阪朝日新闻》则将其看作“维持宪政的最好方式”，鼓励民众投出反对票。寺内内阁刚直接或者间接地提示地方官会议对自己进行援助时，就遭到了《大阪朝日新闻》的激烈批评。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大阪朝日新闻》认为这次革命是“民主主义为了消灭官僚主义所应该发生的事。”并且认为“本该成为俄国人民敬爱的中心的尼古拉二世却落到退位的下场，官僚们应该背负一定的责任”，以此来映射内阁将会对皇室带来不幸。就这样，《大阪朝日新闻》利用国内和国际的局势不断对寺内内阁的官僚主义进行批判，《大阪朝日新闻》与政府由于思想问题的对立，逐渐扩展到使用“国体”、“危险思想”等比较忌讳的词语进行互相攻击。总选举寺内内阁最终获得胜利。《大阪朝日新闻》抨击选举的结果是“国民思想大混乱”，“这次结果半点都不能说明

5 有山辉雄：《近代日本新闻业的构造》，东京出版株式会社1995出版。

6 同上。

民众对寺内内阁的信任”。⁷同时,《大阪朝日新闻》寄予厚望的犬养毅也逐渐向寺内内阁靠拢,国内政治形势逐渐违背《大阪朝日新闻》的意愿,这一切都加剧了它与寺内内阁之间的对立。

对于《大阪朝日新闻》来说,民本主义是世界民主化浪潮的趋势,对于导入日本是乐观的,然而在寺内政府看来,《大阪朝日新闻》的民本主义思想跟所谓的革命思想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反动的,发行量较大且始终占据攻击内阁最前线的《大阪朝日新闻》,无疑是宣传危险革命思想的典型代表。

(三) 西伯利亚派兵与米骚动事件中的催化导致寺内内阁与《大阪朝日新闻》势不两立。

1918年,对西伯利亚派兵问题逐渐成为日本重要的政治课题,日本国内以陆军为中心,希望利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混乱向西伯利亚派兵,此时国内和国际的复杂因素关联在一起。内阁对此的观点并不一致,出兵论和反对出兵论在政治中枢同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报界大张旗鼓地提出了出兵论,连平时在国内问题上与政党相对立的《国民新闻》以及《万朝报》都开始鼓吹出兵。这些鼓吹出兵论的报纸,故意夸大德国的势力,煽动民众对日本国防的危机感,倡导短期的蛮勇的出兵论。这是明治中后期以来,日本报纸在处理国际问题上不断反复使用的伎俩,面对是否向西伯利亚派兵的问题,报界又故伎重演。与此相对,明确提出反对出兵的报纸是《大阪朝日新闻》以及一些在言论界处于边缘地位的报纸⁸。在西伯利亚派兵问题上《大阪朝日新闻》再次成了政府的眼中钉。

面对强硬的反战论,寺内内阁终于采用了强制的取缔措施。《大阪朝日

7 有山辉雄:《近代日本新闻业的构造》,东京出版株式会社1995出版。

8 《大阪朝日新闻》出兵反对论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出兵是对日本经济的浪费。今日如果贸然出兵,来之不易的国家财富和刚刚整備好的兵力将在一朝化为乌有,之后日本将以何为继?日清和日俄两大战争有一半也是依靠外援。要认识到日本经济基础的薄弱和对英美国家的经济依附,反对轻视与美国的协调的强硬的单独出兵论。第二,对待东渐的德国势力,日本没有必要一定使用武力,与俄国人保持亲善关系是第一要义。而应该利用经济方式与之进行对抗。第三,《大阪朝日新闻》提倡反对“侵略的行为”,标榜“尊重他国国民的自主立场”的国际政治理念。

新闻》在4月23日的朝刊以及5月13日的朝刊被停止发行。不到一个月的5月13日的朝刊,再次被禁止发行。但是这种高压并没有打击《大阪朝日新闻》的气焰,5月14日夕刊中依然对政府的外交进行了批判。

紧接着,8月3日,富山县发生“米骚动”事件,很快波及到西日本地区,最后蔓延全国。这对于寺内内阁来说,是致命的冲击,寺内内阁被包围在了追求事件责任的声讨声中。各大报纸开始一起批判寺内内阁的不作为,《大阪朝日新闻》是其中的急先锋,提出“造成物价飞涨的不就是基于非立宪的内政外交以及农商务省的一些政策吗?”同时,以“怨叹的声音,哀求米的声音”为标题,揭露奸商谋取暴利的恶行。对米骚动事件迅速波及全国抱有极大危机感的寺内内阁,于8月14日命令新闻署向所管辖的各大报纸提出“关于米价带来的各地骚扰事件的报道以及号外都被禁止”。与此相对,言论界开展了激烈的反对运动。8月17日,《大阪朝日新闻》社长村山龙平、上野理一,《大阪每日新闻》社长山本彦一、《大阪时事新报》以及其他报社代表,共同召开近畿各报社通讯社联合大会,做出了“弹劾寺内内阁、期待内阁引咎辞职、拥护宪法的神圣和言论报道的自由”的决议,之后《大阪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在8月16日和8月17日分别刊载了拥护言论自由、弹劾内阁的社论。自此,报界与寺内内阁在“米骚动”事件中形成严重对立的格局。

然而,当时民众对于报界联合争取新闻自由的反应却非常冷淡,完全看不到之前一呼百应的民意热潮,《大阪朝日新闻》也无奈承认“一般国民的政治良心”已经“硬化”。对于试图将报纸言论和国民舆论统合在一起的《大阪朝日新闻》来说,在此时却没有得到民众的回应,无疑是个巨大的困境。

(四) 日俄战争后,报社扩张带来的资本压力促使其他报社在笔祸面前集体沉默或转向。

日俄战争后,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存活下来的报纸,大多面临着资本扩张的压力,报社想尽办法完善各自的体制,获得竞争的主动权。表面看起来同在一个战壕里的报纸本质上并不同心,再加上明治以来日本报纸多少都与政党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一旦遇到可以击垮对手的机会或者发现自身的处境

危险时，很多报纸便会选择独善其身，甚至立刻转向攻击昔日战友。

在西伯利亚出兵问题上，《大阪朝日新闻》因为持有出兵反对论，成为报界少数派。倾向于出兵论的政府开始秘密帮助其他报纸形成有利于出兵论的舆论，政府内部主张出兵的陆军也开始向报纸提供机密费用。例如《读卖新闻》的名义社长是外交官出身的秋月左都夫，实际控制人却是外相本野一郎。从这个背景来看，《读卖新闻》自然与本野的出兵论保持一致。“背后的军部势力利用作为宣传机构的《读卖新闻》，对其注入陆军的秘密经费，使《读卖新闻》从经营困难中脱离出来，转向支持出兵论。”《读卖新闻》一共刊载了6回社论对《大阪朝日新闻》进行驳斥，使《大阪朝日新闻》在言论上陷入被动。

笔祸发生后⁹，各报社的应对更是体现了当时日本报界缺乏集体一致反对强权、争取新闻自由意识。9月2日，东京记者大会召开，9月12日以“弹劾内阁”为口号的全国新闻通信杂志记者大会召开。但是，东京记者大会的目的只是弹劾内阁，宣言中提出了寺内内阁的失政之一是言论压迫，与8月的运动比起来，决议、宣言、演说等关于拥护言论自由的内容大大减少。那么，《大阪朝日新闻》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同样参加了关西大会《大阪每日新

9 1918年（大正7年）8月25日举行的“拥护言论弹劾内阁关西新闻社通讯社”大会，代表了全国报社在“米骚动”事件中争取言论自由的高潮。以五大报社为首，来自各地的88个报社的166名新闻记者和通讯记者参加了这次大会，与会者气氛异常高涨。最终大会提出“吾人同业”和“拥护言论”的宣言，并且做出“促使寺内内阁承担失政的责任，速速辞职”的决议。《大阪朝日新闻》8月26日的夕刊中详细报道了大会的情形，特别是在“猛烈指责寺内内阁的暴政，关西记者大会的内阁弹劾演说”的报道中写到：“餐桌旁的与会代表食不甘味，自以金瓯无损自诩的我大日本帝国，正面临可怕的最后审判，默默就餐者脑际闪电般浮现出白虹贯日的不祥之兆。”报道原稿出自当时入社三年的年轻记者大西利夫之手，他回忆当时的大会是一个“俗套的大会”，所以关于大会的报道都是用比较难的中国词语渲染气氛。当时社会部部长长谷川如是闲因为有来客，原稿只看到一半就放下了，工作人员误认为文章已经看完，就拿去印刷，在印刷的途中，社会部副部长后醍醐正六给出了“这篇文章怎么看都不够稳妥，删除”的建议，印刷被紧急停止，“金瓯无损”下面的文字被全部删除。但是，当时已经有3万部报纸印出，只回收了2万部，有1万部已经在市面上贩卖了。

就这样文章还是被当局看到了，大阪府警察部新闻检阅科当夜就与内务省取得联系，提出《大阪朝日新闻》因为8月26日夕刊中的文章违反了新闻法被禁止发行，同时向大阪区裁判所检视局告发了此事。在此之前，《大阪朝日新闻》曾被寺内内阁禁止发行过13次，只有这次移交到了司法部门。大阪地检随后传唤大西利夫和社会部部长长谷川如是闲以及编辑和发行人山口信雄，事态开始呈现扩大化的趋势。

闻》又是如何在笔祸事件发生后迅速转向的哪？当时检事局对《大阪朝日新闻》的起诉是秘密进行的，报界都不知情，只有《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者知道之后做了报道，被起诉的事才被公开化。关于第一次审判，《大阪每日新闻》完全没有报道，11月1日的第二次审判，只对《大阪朝日新闻》违反报纸法第41条被起诉做了报道，但这只是对事实的陈述，完全没有涉及对于审判的看法。对于村山龙平被袭击的事，虽然以“光天化日下村山氏在中岛公园遇袭”为标题做了详细报道，但是，对于当时被逮捕的主犯们的主张也在报纸上进行了刊载，关于犯人的主张介绍得比“白虹事件”还要详细，简直是从袭击者的角度对这次事件向读者做了传达。

《大阪每日新闻》对《大阪朝日新闻》的危机不仅没有支援，甚至有落井下石之嫌。10月15日村山龙平和鸟居素川被迫辞职后，政府授意下的右翼组织浪人会攻击《大阪朝日新闻》的运动在关西地区激烈展开，各报社对政府的言论弹压和右翼团体的言论压迫没有发出抗议的声音，却也没有对浪人会示好，进行任何关于浪人会言行的报道，不得不说这是其他报社基于经营优先的考虑，勉强算是一种消极抵抗。然而《大阪每日新闻》却对浪人会的活动和主张做了详细报道，虽然这些报道是基于事实的基础，但无疑形成了更加有利于批判《大阪朝日新闻》的情况。《大阪每日新闻》故意隐瞒事件的全体真相，只选择其中一个侧面，使用明显有利于浪人会的语言进行言论活动，忘记之前与《大阪朝日新闻》一起进行的言论自由的主张活动，转为国体拥护论，成了浪人会影响扩大的帮凶。

明治时期以来，两家报纸逐渐形成寡占体制，在贩卖、广告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次《大阪朝日新闻》陷入危机，对《大阪每日新闻》来说是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绝佳机会。《大阪每日新闻》也确实没有放弃这次挫败对手的机会，使《大阪朝日新闻》的处境雪上加霜。就这样，《大阪朝日新闻》在“白虹贯日”事件发生之前被民众抛弃，在事件发生后又被“曾经的战友”背叛，面对政府严厉的惩罚和右翼组织的言论迫害，出于经营角度的考虑，不得不选择低头认输，彻底抛弃之间的民本主义路线，高唱“不偏不党”的中立路线，致力于资本扩充和组织完备，重回企业化道路。

五、总结

作为日本新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白虹贯日”事件一直被定位成政府对报纸采取的言论弹压，然而将这次笔祸放在更大的时空背景下考察，会发现笔祸发生的深层原因是多方位的，并且是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的。日俄战争导致日本报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这种变革中，报纸、民众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于读者的急剧增加，明治以来一直与政府关系保持密切的报纸逐渐与民众走到一起，成为对抗政府的力量。这不仅是民众为了获取信息的自发选择，更是报纸为了吸引民众注意力，出于经营目的使用煽动手段导致的结果。此时的报纸，一方面自信于自身对民意的控制能力，一方面认为可以将民意作为与政府之间的缓冲，换取报界的独立性和言论自由，甚至更大的政治目的。日本报界长期以来习惯了用攻击和煽动的方式发表言论，也曾依靠这样的方式一呼百应，然而厌倦了煽动言论的民众逐渐对报纸失去了信任和好感，报纸与政府之间藕断丝连的内部交易也加剧了民心的流逝，报纸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再次由亲近变成疏离，然而以《大阪朝日新闻》为代表的报界却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变化。另外，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口号下看起来团结一致的日本报界并不是铁板一块，“言论自由”的口号在政治强权打压下可以被轻易抛弃，资本扩张的压力也使得某些报纸为了打压对手可以迅速转向，这样的报界环境下，“真实、客观、中立”的专业新闻理念更是无从谈起。

最后，村山龙平领导下的《大阪朝日新闻》错误估计政府当局对于言论的容忍范围，是其最终成为笔祸最大受害者的直接原因。1882年（明治15年）刚刚起步的《大阪朝日新闻》由于经营不顺接受了政府的秘密资金援助，两者间的私密交易一直延续到《东京朝日新闻》创刊。接受政府援助的《大阪朝日新闻》并没有为政府做特别的辩护，成为政府的机关报，而是打着“中立”的旗号以《傍训绘入新闻》为政府的立场进行辩护。这段秘密交易的历史奠定了《大阪朝日新闻》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然而此后的《大阪朝日新闻》出于经营的考虑，选择顺应当时的民本主义思想潮流，试图改变煽动

民意的报界风气，却忽略了当权者对国际潮流以及国内动向产生的强烈危机感，触犯了政府对于言论的容忍底线。

“白虹贯日”事件使日本政府从根本上加紧了对报界的束缚。自此，日本报纸屈服于政治权利，一切以营利为第一目的，寻求商业资本的壮大，日本报业开始从民众动员转向资本主义企业的完备，进入了真正的大众化报刊时期。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白虹贯日”事件对《大阪朝日新闻》为首的日本报界产生重大冲击，却在客观上迫使日本报界集体反思，意识到“不偏不党”才是自我保护的最佳方式，“真实、客观、中立”的新闻专业理念逐渐成为报界活动的金科玉律。

【作者简介】王鲁亚，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中国研究专攻2016级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史专业2015级博士生。